

核心提示:最近,一则关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消息,在社会上广为传播。由于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顿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话题。

# 聚焦“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改革思路:改什么,怎么改?

1月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上海、浙江、广东、山西、重庆5省市今年将试点。虽然目前改革方案仍没有正式公布,但此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介绍,改革的大体方向和思路是:事业单位要分为两类,有行政职能的要纳入公务员的劳动保障体系;另一部分具有经营性质的事业单位,将参照企业职工保障制度改革。

据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主任杨绥教授测算,如果“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按照企业模式计发”,一名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职工工资是每月5000元,假设他的年龄是35年,按现行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计算,他退休后可以拿到4000元左右,而换成企业模式发放,则养老金只能拿到2000元左右。这就意味着改革后,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要少拿一半左右。

目前,我国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分别实施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要逐步达到本人工资的8%。截至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人数达到2.189亿人,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均基本养老金为每月1080元。

而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退

休养老制度与企业不同,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和单位负担,个人不缴费,养老金标准以本人工资为基数,按工龄长短计算发放。机关公务员退休后,基本工资和工龄工资全额发给,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按比例发给。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后,按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两项之和的一定比例发给。

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是国家公务员的4.3倍,占全国财政供养人数的近80%。据有关人士表示,之所以进行此次改革,是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与之配套推进。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对事业单位的分类作出了原则规定。意见指出,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现有事业单位分三类进行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也就是说,事业单位的分类至少应包括“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经营活动”、“从事公益服务”三类。但据目前可知的事

业单位的划分并没有明确说法。

事实上,改革方案下发之日,已经将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划成三个利益群体,是拉大差距还是填平鸿沟,大家议论不止。对此,专家建议,此项改革铺开之前,要充分试点,“三思而行、谋定而动”,总体方案不宜匆忙出台。

社会争议:改革目标指向谁,由谁改?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消息传出后,半月谈读者纷纷来信参与讨论。

河北读者殷建光认为,这样的改革可能导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刺激事业单位人员向行政机关转移,加剧公务员报考热,不利于事业单位队伍的稳定。事业单位大多是知识分子,给他们降低退休待遇,无疑贬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二是降低现有事业单位人员工作积极性,直接影响到我国科技、教育、卫生等诸多公共事业的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三是不利于打造和谐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现在企业的养老金待遇比较低,但是我们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弊端所致,需要我们改革弊端,逐步提高。至于降低比较高的养老金待遇,不能拿事业单位人员率先开刀,而应该从公务员率先开刀,改革设计者应该率先从自我改起。

福州读者曾志杨质疑,将退休金由高改低,可谓困难重重,由

低改高则阳光一片。因企业退休金低,就要让事业单位向企业靠拢,为什么不能让企业由低就高,逐步向事业单位靠拢呢?

专家认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合理方向,是建立健全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全国一盘棋”考虑,做好改革的“加法”,逐步提高企业职工的养老标准,向更高的标准看齐。

改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不能仅仅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还应体现出制度设计的公平——公务员作为改革的决策者,不应排除在改革之外。即使改革始于事业单位,最终也要把公务员纳入,并且应该有一个详细的改革时间表。

河北读者吴睿鹤认为:此次养老金“削峰填谷”式的改革,其方案既缺乏利益主体的充分博弈,没有涉及公务员这一特殊群体,选择时机也欠妥,而且事业单位养老金降幅过大,极有可能使这项公共政策执行起来面临巨大阻力,最终导致无功而返。

改革要兼顾公平

公平是社会和谐的稳压器,公平同样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遵从的重要原则。正因为我们

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问题,改革才显得如此迫切。

安徽读者徐经胜指出,当前,不论是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处于第一等级,企业处于第二等级,无业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处于最低。不可否认,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原因,社保不公平问题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但总的趋势应该是,社保不公平问题首先得到正确认识,并逐步采取措施逐步消除。

福建读者陈英凤表示,就覆盖面而言,目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年老时没有养老金,于是只能养儿防老;他们失业了,也领不到失业救济金,生活立即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享受过高的社保待遇,是否过于不公平?

推进社会保障的公平、均等和普惠,让每个公民都沐浴在社会保障的阳光之下,这是理性政府的必然追求,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那么,就从消除公务员与群众社保差别开始,如何?

(据新华网)



为打造廉洁型、节约型机关,商水县卫生局创新机制,加强系统内部财务管理。图为该局对全县卫生医疗机构财会人员进行医院会计制度财务软件使用知识培训。张丽捐摄

■新闻故事

## “女猪倌”笑谈“养猪经”

□赵永昌 赵光 周新户

近日,笔者来到商水县平店乡赵庄村农民李东真家门口,老远就听到猪叫声,走进一看,她家门前停着一辆购猪车。原来,当天她家有一窝仔猪要出栏了。

“唉!别看现在仔猪价钱不如去年,这一窝猪娃又卖了4000多元。你看,这头母猪又下了一窝猪崽,到3月上旬几千元还是有保证啊!”李东真数着手里的钞票高兴地说。

“那你一年能卖几窝仔猪?到底能赚多少钱?”

“一年至少能卖40多头,纯收入最低也有一万元呀!”李东真今年38岁,是全县“双学双比”女能手。近年来,她积极参加乡村人口学校养殖技术培训班,通过多年实践,熟练掌握了一套仔猪繁育技术,多次在全乡作典型发言。在她的影响带动下,本村及附近乡邻已发展能繁母猪100多头,年出栏仔猪约2000头,养殖户年均增收5000余元。

“很多人觉得养猪既辛苦又有风险,而且投入大、赚钱难,据说你养母猪十几年,有什么诀窍吗?”笔者问。

“养猪确实比喂猪难,风险肯定是有的,关键是你如何生产经营了。养猪卖仔猪就像炒股票,

有升有跌,只要不出现天灾和重大疫情,肯定是有钱赚的。”李东真扳着手指数说,“俺养母猪主要把握了‘加、减、乘、除’四个关键点。一是加强母猪配种和孕期管理。坚持72小时内复配1~2次,提高坐胎率,配种40天以后防蹦跳、防摔跌、防剧烈运动,避免出现死胎或堕胎。二是减少投入降低成本。孕前期母猪多喂青稞饲料,少喂玉米等精饲料,既抗病、保胎,又节省投资。三是切实发挥乘数效应。平时严格搞好日常防疫,避免疫情来临时手忙脚乱。仔猪出生7日龄前利用护仔间和人工辅助相结合进行呵护,千方百计降低发病率,提高成活率。四是破除饲养陈规旧习。猪圈卫生日日清理,杜绝粪尿铺满地的现象,仔猪早断奶、早诱食,尤其仔猪中后期要定时定量,勤添少喂……”

“你自己摸索出来的新方法,可不能轻易外传呀!”跟随采访的刘新停一句幽默的提示打断了“女猪倌”兴致勃勃的经验介绍。

“最近两年,国家对能繁母猪养殖户给予了补贴,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咱农民的关心、对养猪户的鼓励。”李东真稍微停顿了一下,说,“噢!对啦,去年的补贴俺还没领呢,得赶快去领。”

■一吐为快

## 城市公共设施需要呵护

□韩志刚

据2月25日《周口日报》B1版报道,市区滨河西路的健身器材中有一部分受到致命性破坏:太空漫步机的踏板原本是两两相对,现在都只剩下“一只脚”;上肢牵引器的轮子上奔拉着一条“胳膊”,另一条“胳膊”已不知去向;臂力练习器上原有的两个转轮只剩下一个,长时间的风吹雨淋,剩下的转轮也已经锈蚀得不成样子;腰背按摩器不知被谁却走了扶手;组合训练器上一侧的吊环也不翼而飞;孤零零的翘翘板只剩一端完好;伸展器已经面目全非,仅剩一个“铁棍”立在地上。

其实,在我们身边,公共设施遭到人为破坏的事情并不少见:果皮箱惨遭“毁容”、路灯失去“眼睛”、IP电话丢了话筒……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众多周知,公共设施为群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方便所有人的生活,提升整个城市的生活品质。公共设施能否得到妥善保护,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一座城市的文明进步不仅体现在硬环境上,而且体现在软环境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市加大了市政建设力度,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居住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提高。然而,破坏公共设施行为屡禁不止,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不和谐的“音符”。

“周口是我家,人人爱护她。”作为生活在周口的一员,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保护爱护公共设施中来,积极引导“爱护公物,人人有责”的良好风尚,使每位公民都成为公共设施的自觉维护者。毕竟,在硬环境和软环境之间,后者更能反映一座城市的综合素质。

### 声明

2009年2月23日《周口日报》A4版遗失声明“苗林忠医师资格证丢失”因刊登错误,现声明作废。

2009年2月27日

## 周口市物价局公告

周口市中心城区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定于2009年3月18日上午9点在周口市平原宾馆会议室召开。

现将听证会听证人、听证参加人名单公告如下:

- 听证人(5名)**
- 张志全:市政府副秘书长
  - 安国亮:市物价局局长
  - 建志:市公用事业局局长
  - 冯振海:市物价局副局长
  - 冯千敏: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
- 听证参加人(15名)**
- 康建厂(男),酒店经理,居住金汇花园小区;
  - 郭华(女),川汇区小桥办事处干部,居住三高家属院;
  - 梁桂英(女),市民,居住河西居民区;
  - 苏华伟(男),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居住正岩小区;
  - 马宝智(男),市民,居住农机公司家属院;
  - 赵曼丽(女),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居住工商家属院;
  - 李丽(女),祥龙四五酒厂浴池经理,居住中和街;
  - 王润泽(男),永安地产建筑工程师,居住建行家属院;
  - 张宏(女),市人大代表,居住电视台家属院;
  - 王伟(男),市政协委员,居住市委家属院;
  - 徐震(男),市法制办主任,居住市政府家属院;
  - 王凯歌(男),水利设计院院长,居住设计院家属院;
  - 李建国(男),省水利水电学校教授,居住水校家属院;
  - 朱斌(男),市环保局监测站干部,居住二小家属院;
  - 张建华(男),银龙供水有限公司副经理,居住龙达小区。

■基层声音

## “家电下乡”要注重开发“适农”产品

为消除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少家电企业加入了“家电下乡”的行列,开拓农村市场,这对企业、农民群众来说是双赢的大好事。笔者认为,提供“适农”产品是企业开拓农村市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产品功能来讲,一个是“增”,一个是“减”。例如在影碟机产品中开发一些学习功能,就非常符合农民对子女教育投入明显增加的趋势,对农民的吸引力可能更大。但一味增加产品功能,农民朋友也未必买账。

产品价格是农民用户选购产品最敏感、最直接的因素。低成本产品并非低档次产品,企业应该通过技术攻关、挖潜降耗,把成本降下来,为农民群众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

总之,企业只有真正深入农村,注重调查研究并分析农村市场特点,才能找到撬动农村市场的坚实支点,也会最终受到农民朋友的喜爱。

苏童

■外埠传真

## 武汉启动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制度

2月27日开始,武汉市城乡困难群众如遇到临时困难,都可以向村(居)委会申请临时救助。昨日,武汉市民政局、财政部门联合发文,首次启动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制度。

凡持有本市常住户口,因病、因灾及其他不可抗拒性因素等原因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的城乡困难群众家庭均可申请享受临时救助,主要包括以下对象: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外,因特殊原因造成基本生活暂时困难的城乡边缘户(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30%以内);虽纳入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但由于特殊原因仍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较大困难的家庭;各级政府认定的其他特殊困难家庭。

目前,武汉市有城市低保约24万人,农村低保近11万人,农村“五保户”近1.3万人。

(据《湖北日报》)



近日,为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防范能力,周口市金海路前进小学举行了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图为安全演练现场。

王新刚 摄

■社会观察

## 商水返乡农民工实现角色转换

□刘飞

近年来,商水县积极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提供便利条件,出现了返乡农民工当“老板”,当“村官”,当“红娘”的喜人场面,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当“老板”

李传信、李传义是袁老乡二府村村民。前几年,兄弟二人在广东一家皮鞋制品厂务工,由于能吃苦耐劳、善学习,很快便成为工厂里的技术骨干,月薪也从最初的800元提高到2500元。2007年初,兄弟二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到家乡办一个工厂。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创业前期,兄弟二人面临着工厂选址、资金周转、进货与销售渠道等诸多难题,但凭借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兄弟二人诚实守信

信创下的口碑,商水县信义鞋业制品有限公司很快挂牌成立,并很快打开了市场。如今,兄弟二人在广东的销售摊点就有8个,年创利润300多万元,成为当地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典范。

在商水县,像李传信、李传义兄弟二人一样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有上千名,他们为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起到了“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

当“村官”

王华丽是郝岗乡范庄村村民。高中毕业后,她来到广州一家玩具厂打工,前几年,工厂效益一直不错,每年她都能往家寄回一万多元钱,邻居们都羡慕不已。去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后,她所在的厂子也每况愈下,她最终被工厂解雇。去年,全省

实行村民换届选举,王华丽凭借学历高、见多识广的优势,被村民推选为计生管理员。工作之余,王华丽拿出自己常年在打工挣来的钱,在村里办起了一家珠绣加工厂,并利用村人口学校办起了珠绣加工培训班,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无偿地传授给村里的育龄妇女,带动了全村珠绣加工业的发展,产品销往广州、上海等地。

自去年以来,像王华丽一样从返乡农民工到村干部实现角色转换的有20多人,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杠杆作用。

当“红娘”

姚集乡陈庄村农民王方喜,前几年一直在北京一家公司当保安,月薪2000多元,小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可去年的金融危机使他所在的工厂陷入了倒闭的边缘,他也因此失业。春节期间,他回到家,看到村里大棚蔬菜种植十分红火,便萌生了当经纪人的想法。他拿出全部积蓄,并向乡信用社贷了2万元的低息贷款,买了一辆卡车,干起了往郑州、北京贩菜的生意,光今年春节就赚了8000多元。前两天,王方喜家新添了一台电脑,他说:“有了这台电脑,俺就像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全国各地的菜价都了然于胸了。”

如今,在商水县,返乡农民工“当红娘”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他们头脑活、见识广,既为自己找到了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又为当地农民在种植、养殖业方面拓宽了致富空间,起到了“一石两鸟”的效果。